



汇聚中国传媒思想力 深度·理性·独立

学术网 >> 理论 >> 理论方法

资料背景：增进新闻信息含量的有效途径——三种电视新闻节目的新闻背景分析与理论诠释 2005-11-28

作者：李岚 | 35962字节 | 阅读：275次 | 评论：0条 | 关键词：背景资料 新闻、信息量

[关键词]：背景资料 新闻、信息量

内容摘要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探讨背景资料的运用如何增进电视新闻信息含量的问题。研究发现,背景资料的运用比例及形式的多样化对新闻节目品质影响较大:交待背景资料的比例越大,类型越多元化,形式和位置越有序化,越有利于受众有效吸收、理解和占有,新闻信息量就越大。有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电视新闻不应停留于信息的平面报道,在追求深度、立体的过程中,要对新闻信息进行历时性的纵向追溯和共时性的横向联系,利用历史和环境背景资料对信息进行扩展、深化、解释和展望。

一.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着信息,而成为新闻信息的只是指新近发生的、具有新闻价值的,或者表征出事物的最新状态和差异性的那一部分信息,是消除或减少受传者的不确定性的事物最新变动状态的发展趋向及表述(李元授,1994)。

信息时代,新闻传播的本质要求是获得最大限度的传播,也就是最大信息量的传播。如何增进新闻信息量,从认识上我们已经明确:新闻信息量是新闻作品所含信息的量与质相统一的有效信息量,新闻信息量的增值是指加强一条新闻的信息含量,而不是新闻传统中的扩大信道容量,即扩大报纸版面,增加广播、电视播出时间,或在单位空间、时间增加信息密集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说明性的信息(陈力丹,1998)新闻信息具有记录、告知、论证、宣传等功能性特征,新闻传播承担着提供丰富的信息,解除公众对环境的困惑,唤起知觉期待,促进认识从感性向理性转变,合理满足公众有用期待的社会责任。众所周知,出于“丰富”和“满足”的目的,当今的新闻报道已渐渐超越纯净新闻(straight news)的范畴,进入解释性新闻(interpretive reporting)、调查性新闻(investigation reporting)和精确新闻(precision journalism)阶段,许多学者在论证纯净新闻的缺失时,将矛头集中在对新闻的背景资料缺乏了解和分析方面,而解释性新闻等三种新闻报道方式都比较有深度,其报道的要点就在于背景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李贻,1984)。

实际上,报纸新闻早已将背景资料用在大段文字的深度报道中,但以“直观而逼真”的优势,将理解速度强加给观众的电视新闻有何作为呢?研究者以往对电视新闻收视效果,特别是“满意度”的研究分析中,发现有的电视新闻节目资源占有量大,权威性、可信度高,却表现平平,受众不能在有限空间实现最大的信息占有,而有的电视新闻节目则能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以少数新闻精品与其他台繁多而重叠的新闻竞争,形成特定时期的新闻焦点聚集,能够从量到质上满足受众的预期心理,回报了受众的媒介依赖。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讨:背景资料的运用能否增进电视新闻信息含量?新闻中各种背景资料的比例及其运用形式是否能评估电视新闻节目的品质?

二. 文献探讨与理论导引

(一)新闻信息量与背景资料

根据信息传播原理,消息接受者对获得的事件所知越少,事情越不确定,其信息量就越大;相反,由于消息接受者对获得的事件已经知道或基本上已经知道,那么他对收到的这一消息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或没有获得什么信息,这表明通信中的消息的确有量值意义。但对信息作定量研究的信息理论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只是对信息作量的描述与处理,而从未考虑到

j 文章 j 动态

上一篇 Previous

• 从礼乐传播看非语言大众传播形式的演化

作者：黄星民 | 2005-11-28

内容提要本文以中国礼乐传播为主线,追溯大众传播中非语言符号传播形式的演化过程,其中包括原始礼仪、古代礼仪、戏剧、电影、电视与计算机网络等,本文同时还涉及了这些非语言大众传播与语言大众传播形式口语、书、……

下一篇 Next

• 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超越保护主义

作者：(英) 大卫·帕金翰 | 2005-11-28

与美国相比,英国有更长的媒介素养教育历史。在英国,媒介素养教育业已成为学校课程中的固有内容。就像教育领域中的许多问题一样,有关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方法一直是长期富有争议的问题。上一代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

如何提升 你的专业高度?

这里汇集国内20余家专业出版机构近5000种图书,目前国内传媒专业程度最高的网络主题书店 >>>

中华传媒书店
BOOK.MEDIACHINA.NET

“语义”的问题(李茂政,1992)。现代信息论认为,任何信息都包含着统计信息、语义信息和有效信息三方面,新闻信息量是量与质相统一的有效信息量,实质是结合语法、语义和语用三个信息层次所作的动态度量。从新闻信息传播的研究来看,由于受新闻价值判断等特殊因素的影响,新闻信息量的定量指标一直难以确立,新闻信息量统计方法及公式尚无定论。比如,孙晓光(1992)曾提出一个概念:新闻信息量真值,定义为:随机事件的新闻中所含有的信息点的极大值与新闻价值点的极大值之和,把新闻的5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因)、一个H(如何)、一个M(意义),视为7个信息点,把新闻价值的6个要素,即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显著性、预测性和可读性视为6个新闻价值点。实际上,这种信息单元简单相加的计量方法并不见得科学,因为就一则新闻报道来讲,它的信息构成应取决于对新闻事实反映的需要,而不一定面面俱到。但值得肯定的是,新闻信息量真值一说包含了“何因”、“如何”、“意义”等因素,这就强调了新闻内容的充实、深度的意义。提供更多的受众无所知事件的信息或增加受众已知事件的其他无所知的信息,都是在增大消除或减少受传者的不确定性的可能性,即增加信息量,这就产生了对深度背景资料的要求。

从系统论观点出发,喻国明(1996)将新闻作品中输送信息的渠道概括为“言、象、意、道”四个基本层次,从新闻语言、新闻事实、新闻倾向性、客观规律和主观方针等方面探讨增大新闻信息含量的方法。在这几个基本层次的论述中都提到了对背景资料的使用。首先是出“言”,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能在新闻信息与受众原有的、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之间搭起一座桥,使信息传播畅通无阻,从而增进受众的理解,实现新闻的可读(视)性;其次是立“象”,从网络式的角度“立象”就是将新闻事实置于时代和社会生活的矛盾错综交织的网状结构中,即环境背景资料中,使新闻事实起到一叶知秋的作用;最后为了抒意达道,可运用对比联想的方法,记者不直接对新闻事件表示看法,而只是将有关的背景灵活穿插,与新闻事件构成直接、间接的联系,造成对比反差,激起受众的联想,领悟其中的道理和情感。

李元授(1994)认为,新闻信息有显态和隐态两种表现形态,隐态信息依托于某一新闻事实的显态信息而存在,从而引发受众的联想,使其心领神会,获得更多的信息,产生更大的效应。这就说明,一则新闻的信息量是否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是否含有充分的隐态信息。要充分地表现新闻的隐态信息,除了选择新闻事实和报道角度外,就是要注意选用背景资料,用以衬托主要新闻事实,突出主要信息,另外,他还认为加强各单元新闻信息组合的有序程度,提高整体效应也是增大新闻信息含量的途径,其实,这里的新闻信息组合还应包括新闻背景资料与主要新闻事实的有序组合,即如何穿插,这在后面将具体论述。

喻国明和李元授关于新闻信息量的论述中都谈到了交待新闻背景资料能起到激发受众的联想,增进受众理解的作用。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当中,传者和受众往往要分别充当解释者和理解者的角色,在伽达默尔看来,“所谓解释(Auslegung)正在于:让自己的前概念发生作用,从而使本文的意思真正为我们表述出来。”(Gadamer,Hans Georg,1999:507)这里的“前概念”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和解释者提供“视域”(Horizont),这种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之与其他视域相融合。

K.阿斯普(Asp,1980)提出了以“资讯性”(informativity),也即是增进信息,增进知识的程度作为评估新闻节目品质的概念,并将“资讯性”转化为“密度”(density)、“广度”(breadth)、及“深度”(depth)三个概念,其中关于深度的概念被具体操作化为新闻中交待背景资料的比例,藉以评估新闻的品质,这也是考察新闻信息量的方式之一。阿斯普在研究中得出了对媒介输出规模的信息评估指数。他认为资讯性表现为新闻节目信息评估的尺度,而对新闻节目的评估与该节目提供的资料容量的期望值相关,对期望值的肯定和否定的偏差与资讯性的肯定和否定程度是一致的。深度地灌输信息所具有的价值以适应媒介输出的信息评估模式,从理论上说也是可能的。但由于有用的资料太少(对于某个社会热点问题的报道,他研究的新闻节目中有一半没有深度报道材料,而其余节目交待的背景资料只占总报道空间的2%到7%),阿斯普将重点放在了新闻中论点的多寡,不同形态论点的数目,即密度和广度的研究上,而没有将这种关于深度的可能性拓展下去。

K.G.巴恩赫斯特和D.穆兹(Barnhurst Mutz,1997)曾对《俄勒冈波特兰报》、《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进行量化分析,研究20世纪新闻报道的界定,发现新闻故事更长了,分析成分更多了,新闻从业人员现在开始为社会问题、各种解释和主题提供更多的背景,而形成这种趋势的根源在于新闻市场的竞争和新闻文化的运作。对印刷新闻内容的影响主要来自电视。电视能够详细地展现电影般的事件,配以图画和色彩,电视使新闻的视觉效果不仅更新鲜而且更引人入胜。由于提供大量新闻事件背景的深度报道实现了新闻报道新思维的拓展,电视新闻反开始借鉴这一报纸用来挑战电视大容量、快时效传播优势的报道方式,在展现新闻事件的背景和行为方面,电视图像显得比报纸更有能力,C.A.斯蒂尔和K.G.巴恩赫斯特(Steele Barnhurst,1996)对电视政治新闻的研究表明,电视媒介在其短短二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日益增强了对意境的使用和对解释性构架的依赖。巴恩赫斯特和穆兹(Barnhurst Mutz,1997)指出新式的长篇报道(new long journalism)实现了对新闻概念的重大修改。

由此可见,新闻内容越深化,新闻信息量越大,就越接近受众期望值,越能满足最大限度消除不确定性的信息接受要求,而背景资料的使用能够唤起传者和受众的前理解,促进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联想,使新闻信息含量不断扩大,由于新闻信息含量的分析,目前只能建立在模糊定量的框架体系上,所以研究者试图从背景资料本身的含量及其与主要新闻事实发生的各种联系上去寻求增进新闻信息含量的有效途径。

(二)新闻背景资料的类型

任何新闻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与新闻事实有关的环境与历史材料,就是新闻背景资料。它是新闻要素中“为什么”的展开,是对形成新闻事实的来龙去脉,历史环境中各种矛盾之间内在的辩证关系的剖析与解释,是对新闻影响的更充分的预示。新闻背景重在解释个别事例与一般事物或一般现象之间的关系,解释单个的新闻事实与系列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说,背景资料的使用能促进理解,对深化新闻有直接作用。

新闻背景资料有纵向性(发展的来龙去脉)和横向性(与周围事物的关系)的特点,相对于当前最新发生的主要新闻事实的动态性,无论环境材料也好,历史材料也好,都具有历史性。J.A.埃迪(Ed,1999)将记者运用新闻背景资料称为唤起“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他认为运用“集体记忆”的办法是反直觉的(counterintuitive),记者传统上高度评价在第一时间发布最新消息,许多新闻故事会因为它们发生的当天已经没有空间报道它们而过了时没法用了,但实际上过去发生的故事能以三种基本形式出现在新闻里,即纪念性材料(commemorations)、历史类比性材料(historical analogies)、历史关联性材料(history context)。

纪念性材料有时是指“周年报道”,媒介富有人情味地真实地再现过去时光,对于未曾经历那一事件的受众来说影响会更大。如关于“中英联络小组今召开最后会议”的报道在主体部分说明“应中方要求设立的中英联合联络小组85年开始第一次会议,目的是……”(《时事直通车》,1999年12月7日)。纪念性材料的报道并没有试图将过去与现在意味深长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政治和外事新闻,因为国际形势与外交情况都在发生改变。纪念性材料比较容易在新闻内容检索和纪录片目录中找到。历史类比性材料用过去事件将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去分析和预测当前事态的发展,而过去发生的有可能被当作某种“历史教训”(lesson of history)。如“中美空军参加香港拯救演习”,在导语中点出“这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轰炸之后,中美两国空军第一次在同一个活动中出现”(《时事直通车》,1999年12月1日)。历史类比性材料可能来自传统的媒介消息源,如政府官员,有时记者自己进行类比,这就容易被贴上“社论”和“新闻分析”的标签。实际上,记者选择相类似的过去事实并进行类比,而并没有将他们的工作界定为新闻分析,因为过去发生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信息资料,过去事件真正发生过,当前事件正在发生,观察二者的相似与区别之处好象并无评论之嫌。历史关联性材料不同于历史类比性材料之处,在于它们回溯过去与现在情况发生关联的部分,而不是类推和比较。如“南沙群岛问题应逐步解决”这条新闻,以中国表示支持由菲律宾草拟的南中国行为准则的概念并愿意和东盟磋商为由头,引出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沙问题上的态度,并适时交待背景“中国和菲律宾从95年开始多次为美济礁素有军事动作,但没有直接冲突,而菲律宾在一个多星期之前拖回了滞留在南沙黄岩岛(音)的一艘军舰……”(《时事直通车》,1999年11月26日)在新闻报道中,历史关联性材料被用来解释事件的来龙去脉(how we get here),它们常被用作新闻背景资料详细地解释当前事件的原因,帮助受众对当代形势有更丰富的理解。需要强调的是,以上三种背景资料都是作为当前报道中的事实而非评论出现的,并不会影响新闻的客观性,它们的重要性体现在“我们的过去是我们的将来的重要成分,我们的社会记忆是鉴定我们社会身份主要元素”(Edy,1999:83)。

可见,运用“集体记忆”的办法交待背景资料对于当前报道的作用无疑是重要的,根据新闻背景资料特点和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可将其分为衬托对比性材料、注释说明性材料和阐述解释性材料。衬托对比性材料,也即历史类比性材料(historical analogies),通过过去的典型事例和景象,以及有强烈对比性的印象、数字和语言等,与当前事件进行对比与比拟,往往带来一些戏剧性的效果,引人入胜;注释说明性材料一般用来点明新闻事实产生的原因、条件和环境,包含历史关联性材料(history context),通过横向纵向的联系,交待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阐述解释性材料比前两种背景资料更深入,对新闻事件内部或新闻背后的因素作较深刻的剖析、预示和展望,往往在“为何”(why)这个新闻要素上表达较多,起到“解惑”作用。再如“南沙群岛问题应逐步解决”,在结尾处交待“据石油专家估计,南沙群岛的石油含量比科威特还要高,是世界第四大油田,南沙群岛把守了太平洋至印度洋、波斯湾的战略航道,有日本军事专家称,只要能够掌握南沙的控制权,就能够在下世纪成为地区霸主”(《时事直通车》,1999年11月26日)。而起周年纪念作用的纪念性材料(commemorations)在这三种背景资料的运用中都可能出现,只是起到的作用不同罢了。

因此,本研究认为上述这些背景资料的综合和灵活运用,可以从纵深方面,增强新闻信息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即增大新闻的

有效信息量,提高电视新闻节目的品质。基于上述文献分析与讨论,本研究提出两项研究假设:

- 1.交待背景资料的比例越大,背景资料的类型越多元化,形式和位置越有序化,越能有效增进新闻信息含量。
- 2.背景资料的运用比例及形式的多样化对新闻节目品质影响较大。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旨在探讨背景资料的运用如何增进电视新闻信息含量的问题。本研究所进行的内容分析的新闻节目,采用统计学意义上的“小样本”,样本为1999年11月26日至12月7日12期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现在播报》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时事直通车》节目。

选择这三档新闻节目作为研究对象的契机是这样的,研究者1998年8月至1999年5月曾为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作过大量媒体分析报告,发现许多同一事件的报道中,凤凰卫视的《时事直通车》在新闻事实的选材和细节方面并无特别之处,甚至有的新闻本身还是以中央台为来源,但新闻报道的深度、新颖性及可视性却明显高于中央台《新闻联播》。而每逢重要事件发生,新闻从业人员和媒介研究人员也常常以《时事直通车》为参照对象。另据有关资料表明,中央台开播不久的全新新闻节目《现在播报》在原来整点新闻的基础上持续增长了三个百分点,其新闻相对数量并不比《新闻联播》多,但信息量似乎总显得比《新闻联播》大。因此研究者有兴趣以这三档新闻节目为研究对象,考察背景资料的运用与新闻节目信息含量、新闻节目品质的关系。三档节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新闻联播》正式创办于1978年8月1日,是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每日19点至9点30分播送国内外要闻的重要栏目,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地县级电视台同时转播,是我国最早的固定栏目之一。据1999年有关数据表明,《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高达41.2%,收视排名一直居于各类节目榜首(《收视调查》,1999)。

《现在播报》是1999年中央电视台新闻栏目改革的最大举措,于7月1日开始在第一套节目21点至21点20分每日播出。《现在播报》将原来普通的滚动播出的5分钟整点新闻改造成了长达20分钟的名牌综合性新闻栏目,是中央电视台晚间时段的一档全新新闻栏目。《现在播报》自开播以来收视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收视排名在消息类新闻栏目中仅次于《新闻联播》(《收视调查》,1999)。

《时事直通车》创办于1996年,是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最重要的新闻资讯节目。同《现在播报》一样,《时事直通车》也是在9点的黄金时段播出,总时长30分钟。凤凰卫视在中国大陆的稳定收视人口目前已超过1.47亿人(《大陆收视调查》,1999),凤凰卫视中文台的观众满意指数仅次于中央一套,列第二位(《满意度调查》,1999),而《时事直通车》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最受喜爱的十大栏目中排名第一(《大陆收视调查》,1999)。

以上三档新闻节目都是中国大陆收视率较高的重要的中文电视新闻节目,且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新闻文化氛围,呈现从传统到创新的不同新闻形态,三者之间在新闻运作方式上存在着明显而微妙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可比性。以上述三档新闻节目为对象来研究分析新闻背景资料的运用情况,代表性强,虽然样本总量不大,也未按随机抽取原则来选择样本,但见微知著,对新信息传播理论与实务研究应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下面在本研究文献探讨理论诠释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确立关于背景资料运用的定量分析的分类依据。作为一种较自由的结构元素,背景资料的运用首先应体现为与新闻事实相融,其次应能在新闻结构的层次变化中起到谐调作用。由于电视具有声画结合的传播特点,电视新闻交待背景资料的表现形式一般有画面配解说和纯解说两种,其中纯解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口播,二是画面未配合解说内容,如解说词在追述5年前的背景资料,画面出现的仍是当前事件的画面,并无历史画面。本研究将交待背景资料的方式分为嵌入式和隐入式两种。嵌入式交待背景资料的方法是指结合电视声音线性听知规律和画面视觉效果的要求,把背景资料以段落或句群的形式置于新闻不同的结构部分,造成层次的错落有致;如“美国火星探测船音讯全无”,在结尾最后嵌入一段“火星极地登陆者号这次到火星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火星是否有水源和生物,科学家相信,火星过去可能有水源。”同时配上火星探测船在火星上工作的电脑模拟动画图像。(《时事直通车》,1999年12月4日)隐入式交待背景资料的方法是指对背景资料不作直接的交待和表述,而是把背景资料化整为零,以句子和句子成分的形式隐入导语、主体或结尾中去。如“中国电信网提前平安进入2000年”,也是在结尾交待新闻背景,但篇幅有限,只在结尾以“从而提前平安解决了计算机不能识别闰年的问题”(《现在播报》,1999年11月28日)一句带过,令受众豁然开朗。一般来说,出于对镜头长度和剪接率(镜头转换的速率)的考虑,以画面配解说来表现背景资料的方式多为嵌入式,所以本研究将画面配解说规定为嵌入式画面配解说,如新闻“南沙群岛问题应逐步解决”在主体中交待中国与菲律宾关于南沙问题的纠纷的背景资料时,配发一组南沙海域及几个人工军事岛的画面;(《时事直通车》,1999年11月26日)纯解说则可

分别以嵌入式和隐入式两种方式出现,而如何嵌入和隐入完全根据这条新闻的内容和结构布局的需要而定。

新闻报道一般都由几个单元信息组成,背景资料与这些单元信息不同组合方式和层次安排,都会形成不同的传播效果,合理安排背景资料的位置,将使新闻内部结构有序化,信息系统优化,从而提高整体效应和有效信息量。不同类型、不同表现形式的背景资料安排在不同的结构部分,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如一般而言,穿插在导语中的往往是衬托对比性材料,引起受众的收视兴趣;与主体组合的背景资料主要用来对导语所揭示的新闻事实加以注释和说明,再由主体对事实加以展开,这种新闻篇幅较长,节奏较迂缓;背景资料在结尾出现时,对新闻事实作进一步的补充、解释,或引出新意,或对新闻事实暗寓褒贬。按系统论观点,单条新闻是由一定数量的相关的新闻事实及其背景资料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事实的简单罗列,只是部分相加,价值较小,若能在受众大脑中把信息有效地组合起来,价值就可增加,信息含量就可以大于部分之和。

本研究分析单位为每条时长45秒(含)以上的新闻,45秒以下的一般短消息由于时间较短,内容较简单,故不在研究分析之列。一般来说,不同的电视新闻节目由于在栏目定位上的差异会有不同的报道重心,从而体现为对重点题材新闻的集中报道,如《新闻联播》的报道重心是政治和外交新闻,兼顾部分社会和经济新闻;《现在播报》以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为主,政治和外交新闻则以一句话要闻的形式集束播出;《时事直通车》以香港这一发达的信息中心为基地,选用世界主要新闻机构每日发布的新闻信息,向亚洲观众制作播送中文新闻时事,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新闻的报道量都比较大。而受众在有选择地收看新闻节目时,也会以这些重点题材的报道为集中兴趣收视点,所以,在分析新闻背景资料在新闻节目中运用比例的同时,要考察背景资料是否主要分布在重点题材的新闻中,因此要进行题材分类。结合前面所论述的运用背景资料的分类依据,在内容分析时本文研究所采用分类项目为:

(一)未交待背景资料的新闻的题材(共分十类)

1=政治新闻2=外事新闻3=经济新闻4=社会新闻5=法制新闻
6=科技新闻7=教育新闻8=体育新闻9=卫生新闻10=文化新闻

(二)交待背景资料的新闻的题材(共分十类)

1=政治新闻2=外事新闻3=经济新闻4=社会新闻5=法制新闻
6=科技新闻7=教育新闻8=体育新闻9=卫生新闻10=文化新闻

(三)新闻所运用的背景资料的类型(共分三类)

1=衬托对比性材料2=注释说明性材料3=阐述解释性材料

(四)交待背景资料的表现形式(共分三类)

1=画面配解说2=嵌入式纯解说3=隐入式纯解说

(五)安排背景资料的位置(共分三类)

1=背景+导语——主体——结尾2=导语——背景+主体——结尾
3=导语——主体——背景+结尾

在具体操作上,研究者连续录制12天两家电视台三档重要新闻节目,为保证准确度,并复制了《新闻联播》、《现在播报》的播出串联单,同时在凤凰卫视网站逐日查询《时事直通车》的播出单。结合录像和串联单逐条审看,并作记录,根据各项分类进行统计,在分类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时间原因,来不及训练合作分析者,也没有进行合作分析者认同系数分析。所有内容分析均由研究者一人完成。

四、研究分析

(一)结果

长期以来,一些新闻媒介和媒介研究者常常把单位时间内播出的新闻条数当成新闻信息量来统计,并以此作为媒介间比较的依据,实际上他们所研究的是新闻媒介作为系统所传播的信息量,而非新闻的信息含量。以本研究的样本为例,《新闻联播》12期样本单位173条,每期时长30分钟(含片头,以下节目同),平均每分钟0.41条;《现在播报》12期样本单位93个,每期时长20分钟,平均每分钟0.39条;《时事直通车》12期样本单位141个,每期时长30分钟,除去6分钟插播广告时间,实际时长24分钟,平均每分钟0.45条。从新闻传播的信道容量来看,三档新闻节目几乎不相上下,“信息量”似乎都比较大,这点由每分钟平均值可知。但前面已讨论过,增进新闻信息量,并不是意味着扩大信道容量,关键是使所传播的信息在有限空间更为有效。本研究的目的是论证关于新闻背景资料的运用有助于增大新闻信息含量,提高新闻品质的假设,那么,首先应考察新闻节目对背景资料的运用比例,如表一所示:《新闻联播》交待背景资料的新闻占样本总量的比例最低,

仅为27.2%,与《现在播报》的75.3%、《时事直通车》的72.3%差别较大。《现在播报》新闻背景资料运用得最多。

再看三档新闻节目交待(未交待)背景资料的新闻题材分布情况,《时事直通车》交待背景资料的政治新闻条数相对最多,比例最高,占29.4%,其次是经济、社会和外事新闻,外事新闻全部都交待了背景资料;《现在播报》交待背景资料的新闻题材分布由大到小前四位依次是社会、经济、法制和科技;《新闻联播》交待背景资料的新闻题材分布依次是外事、经济、政治和社会、法制(并列),但需要指出的是,《新闻联播》未交待背景的外事新闻的数量相对最多,比例也是最高,占未交待背景的新闻的47.6%,高出已交待背景的外事新闻的比例近20%,未交待背景的政治新闻比例位于第二。

表一 三档新闻节目交待(未交待)背景资料的比例及题材分布情况

单位:条(点总数百分比)

题材	新闻联播n=173		现在播报n=93		时事直通车n=141	
	未交代	交代	未交代	交代	未交代	交代
政治	26(20.6)	6(12.8)	1(4.3)	1(1.4)	16(41)	30(29.4)
外事	60(47.6)	13 (27.7)	1(4.3)	0(0)	0(0)	12(11.8)
经济	15(11.9)	10 (21.3)	4(17.4)	17 (24.3)	7(17.9)	22(21.6)
社会	17(13.5)	5(10.6)	10 (43.5)	22 (31.4)	8(20.5)	16(15.7)
法制	3(2.4)	5(10.6)	4(17.4)	15 (21.4)	0(0)	5(4.9)
科技	1(0.8)	3(6.4)	0(0)	5(7.1)	0(0)	7(6.9)
教育	1(0.8)	0(0)	0(0)	2(2.9)	0(0)	2(2)
体育	0(0)	1(2.1)	0(0)	1(1.4)	8(20.5)	6(5.9)
卫生	0(0)	1(2.1)	3(13)	4(5.7)	0(0)	0(0)
文化	3(2.4)	3(6.4)	0(0)	3(4.3)	0(0)	2(2)
总数	126(100)	47(100)	23(100)	70(100)	39(100)	102(100)
占样本比例(%)	72.8	27.2	24.7	75.3	27.7	72.3

由此看来,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新闻报道的深度、新颖性及可视性高于中央台《新闻联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背景资料的比例较高,特别是政治和外事新闻,由于受众在《新闻联播》中很少得到有关背景材料,也缺乏对此类新闻深度理解的可能,《时事直通车》就成了补充信息、扩展信息的重要媒介。《现在播报》的报道重心是社会和经济新闻,能够在这些题材上较多地交待背景,也是节目胜出之道。

以背景资料来提升新闻信息含量,不仅体现在新闻背景材料的比例上,还体现在背景资料的交待类型和方式是否灵活,是否多元化和多样化,《时事直通车》和《现在播报》这方面表现较好,《新闻联播》则比较一般。如表二所示:

一、背景资料类型方面。《现在播报》使用衬托对比性和阐述解释性背景材料的比例比《时事直通车》略高;《新闻联播》使用的绝大多数背景资料都是注释说明性的,占89.4%。

二、交待背景资料的形式方面。《时事直通车》使用三种表现形式的比例较接近,显得多样化,尤其是使用了较多的隐入式纯解说形式,具有较高的表现技巧;《现在播报》和《新闻联播》较多使用嵌入式纯解说和画面配解说的形式,隐入式的比例较小。作为声画一体的视听媒介,三档新闻节目使用画面配解说的比例都不算最高,都未过半。

三、安排背景资料的位置方面。《新闻联播》将背景资料放在新闻主体位置的比例最高,达80.9%,在导语中安排背景资料的比例最小;《现在播报》和《时事直通车》在新闻主体中安排背景资料的比例较大,同时在导语和结尾中也有不少背景资料。

表二 三档新闻节目交待背景资料的类型、形式及位置情况比较

单位:条(占总数百分比)

分类	新闻联播n=47	现在播报n=70	时事直通车n=102
一、交代背景资料类型	新闻条数(%)	新闻条数(%)	新闻条数(%)

1、衬托对比性	3(6.4)	11(15.7)	12(11.8)
2、注释说明性	42(89.4)	49(70)	74(72.5)
3、阐述解释性	4(8.5)	15(21.4)	21(20.6)
二、交代背景资料形式			
1、画面配解说	21(44.7)	32(45.7)	40(39.2)
2、纯解说(1)嵌入式	22(46.8)	35(50)	43(42.2)
(2)隐入式	5(10.6)	12(17.1)	39(38.2)
三、安排背景资料位置			
1、导语	5(10.6)	19(27.1)	29(28.4)
2、主体	35(80.9)	38(54.3)	70(68.6)
3、结尾	12(25.5)	25(35.7)	32(31.4)

注:考虑到分析单位有多种类型和方式交叉混合的情况,故统计条数大于样本单位总数。

(二) 讨论与解释

1. 《新闻联播》背景资料运用较少,新闻信息含量明显不足

传播学媒介依赖理论(media dependency theory)认为,在日趋复杂的现代社会里,人们对外在世界的的不确定感愈加强烈,所以需要大众媒介提供有关外在世界的信息以减轻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感,这就使大众媒介具有越来越大的权利,甚至替人们定义或建构外在真实。《新闻联播》作为中国最早设立的固定新闻节目,在其他电视节目尚势单力薄的时候,就使受众多年养成了晚7点开机,定时定点收看的习惯,这样就形成了《新闻联播》成为中央台的王牌节目和电视新闻权威的受众心理基础,但“《新闻联播》从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和热烈的反响”(郭镇之,1996:40)。

由前面定性和定量研究分析可知,《新闻联播》报道的新闻总量不少,但多为简报式的平面报道,缺乏深度背景资料,新闻信息含量不高。《新闻联播》的报道重心是政治、外事、经济新闻,从该栏目信息资源占有量和媒介权威性的角度看,这些题材的新闻背景资料应该是最充分的,但《新闻联播》这三种题材的新闻大多数未交待背景资料,这就容易出现语言学“僵滞的抽象”(dead level abstraction)的情形(Severin Tankard.Jr,1992),在表述一些高抽象层次的新信息时,如果不以相关背景资料加以具体说明或解释,就无法落实到较低的抽象层次,如“温家宝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条新闻(《新闻联播》1999年11月26日),如果适当交待有关中央经济会议的背景资料及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更有利于激发收视兴趣,易于受众理解和接受。另一种情况,新闻信息的表达若一直停留在低抽象层次,比如外事新闻,只是繁琐地记录国家领导人之间迎来送往,出访,接受采访等程式化信息,不联系历史关联性材料或类比材料赋予深层次的事件意义,就无法吸引受众注意力,不能满足受众期待心理。

《新闻联播》交待背景资料的类型和方式也较为简单,或者可以说是保守和谨慎,单一使用传统的注释说明性材料,具有一定知识性,但缺乏深度理解的可能。《新闻联播》将背景资料主要安排在新闻的主体部分,形成套路,缺乏结构层次变化,没有将背景与新闻主要事实的信息系统优化,这就无法进一步提高整体效应和有效信息量,新闻品质也不会高。

媒介系统对珍贵信息资源的控制是形成媒介依赖关系的原因(德弗勒,鲍尔-洛基奇,1990),《新闻联播》是中国唯一一家全国性电视媒介——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对新闻资源,特别是国际新闻独家采访报道的垄断地位,决定了受众的媒介依赖心理。大众对媒介有认知、情感、个人整合与社会整合等需求,这种依赖的目的是使用与满足。但如果只强调受众的媒介依赖而忽视受众的使用与满足需求,就会由于新闻信息含量低于受众的期望值而令他们重新作出媒介选择。

2. 《时事直通车》注重选择视角独特的背景资料拓展单条新闻的报道深度,补充新闻信息含量

《时事直通车》是享有“中国电视特区”之称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的当家栏目,香港的传播媒介享有经营自由,传媒活动不受政府控制,因此从节目的信息量和背景资料选择的自由度方面,和中央台相比,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即使是播出与《新闻联播》、《现在播报》同样内容的新闻,它也能使用视角独特的新闻背景,使观众获得信息补充的可能。

《时事直通车》将背景资料用在政治、外事和经济新闻上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节目特别善于在导语中使用隐入式的衬托对比性或注释说明性背景材料,先声夺人或设下悬念,然后在主体中以嵌入式段落详细交待,比如“日朝同意恢复中断六

年谈判”：

导语:日本和朝鲜同意就恢复外交关系展开新一轮的谈判,这将是两国7年以来首次进行有关谈判……

主体:……日本和朝鲜在93年初恢复了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不过在同年因为日本提出了一名日本妇女在朝鲜失踪的问题而导致谈判中断。……(《时事直通车》1999年12月3日)

这些背景资料的运用将历史事实与当前事实联系在一起,唤起受众的记忆,促进受众当前视域与其他视域相融合,使新闻的信息含量成倍数增长。

就连最容易流于程式化的国家领导人出访的消息,《时事直通车》也要以背景资料点出意味深长之处,如“李鹏继续在阿曼访问”：

结尾:这次李鹏首次访问阿曼也是他以人大委员长的身份进行亚非六国的最后一站。……

(《时事直通车》1999年12月3日)

最有效的传播是活用高低不同的抽象阶梯(Severin Tankard Jr, 1992),隐入式背景资料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它占有空间小,灵活、机动,最能在惜时如金的消息类新闻节目中体现水平。

香港是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信息资源非常丰富,《时事直通车》的时事报道大多取自国际卫星提供的最新新闻信息,节目凭借对这些资源的开发,灵活多样、恰到好处地运用背景资料,使新闻显得很精致,在数量上,它没有必要与《新闻联播》等中央大台的新闻节目竞争,但利用背景资料转换报道角度,抓住其他新闻节目报道不到位的地方,在重要关头游刃有余地找到适合自己的报道内容,或利用新闻背景把选中的新闻做得更深、更透、更精。以新闻精品与其他新闻节目众多而重叠的新闻竞争,可取得以少胜多的新闻传播效果。

3.《现在播报》以大量的新闻背景资料提高节目内在新闻价值,提升新闻有效信息量

我们承认,“每一则新闻不仅是行动者的主观活动产物,也是客观社会制度的产物”(戴育贤,1994:179)。我们在研究电视如何用新闻信息建构客观真实,达到受众期望值的时候,往往要以客观运行制度为着力点,这样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一方面肯定新闻行为的人为本质,一方面又将它视为个人所从事的,又不能受其意志所左右的行为。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新闻联播》与《时事直通车》在运用背景资料的行为上的差异。但如果说《时事直通车》可能是打了播出自由度的擦边球,“拾遗补缺”地利用新闻背景资料来一鸣惊人的话,那么同《新闻联播》扮演一样的社会角色,实行目标一致的传播功能的《现在播报》能够较好地运用背景资料又说明了什么呢?

《现在播报》也是国营所有新闻体制的产物,但作为中央台报道模式由“传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的一块新闻改革试验田,一直在为规范行动者——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方式,回归电视传播本质特性而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效果,这在节目对背景资料的运用方面有所反映。为保证大信息含量的实现,节目力图依据受众收视兴趣来选择和处理背景资料,在遵循新闻规律的基础上,达成背景资料与新闻主要事实的配合。

语言是日常行动者进行诠释活动的首要工具,在电视新闻中,语言的解释有助于“建构”真实。每个人储存信息的能力不同,所以拥有的背景知识也有多寡之别,这些差异将会影响人们对新闻信息的理解程度。在《现在播报》报道量较大的与人们生活贴近性强的新闻中,有的报道所涉及的问题要么费解难懂,要么错综复杂,非一般受从所能通晓,运用阐述解释性的背景资料有助于缩小“知沟”(knowledge gap),例如“我国颁布非处方药专有标识”：

主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督司司长同期)非处方药长期在临床使用,其安全性比较可靠,消费者可以进行自我药疗。这种印有专有标识的药品在经营的药店,消费者看到它后,就可以识别它是非处方药,这样对于消费者进行自我药疗,安全、合理地使用药品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播报》1999年11月26日)

该报道利用专家或有关方面的权威人士提供阐述解释性背景材料,在“为何”这个要素上作较多的文章,增加易读性,减少受众接收的费力程度。

由背景资料的运用情况分析结果可知,《现在播报》善于收集“集体记忆”,运用了较多的衬托对比性背景资料,这些材料多数在导语里出现,通过过去有强烈对比性事例、数字和语言等,与当前事件进行对比与比拟,富有戏剧性的效果,如“山西武乡:烈士碑挨汉奸墓老区人匪夷所思”:

导语:地处太行山的山西省武乡县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在五十多年前的一次反扫荡战斗当中,有六位抗日战士牺牲在魏家窑村,为了纪念他们,当时的晋察冀政府为他们树立了一块纪念碑,而五十年后,魏家窑村的村委却将纪念碑移到了村外。(《现在播报》1999年12月2日)

《现在播报》在开播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即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这与使用背景资料强化深度理解,加大信息含量不无关系。当然,为了使新闻节目品质更加与“平民视点”的栏目定位相契合,《现在播报》还应该大胆使用化整为零,穿插自如的隐入式背景资料,既节约篇幅,又能活用高低不同的抽象阶梯,适时加以注解,实现最有效的传播。

五.结论与建议

电视再现客观世界的真实效果,使受众对媒介可能成为穿透外界事件的窗口的期望大大高涨。虽然电视新闻故事是一种由技术和意识符号结构而成的产物,但媒介工作者应努力使它的技术常规自然化,传播的内容更为集中和有序化。由于媒介种类的迅速增加,独家信息的获得已经越来越难,媒体间的信息重复率会越来越高,电视节目除了比信息传播的时效性、现场性外,更重要的是比信息的处理能力。电视新闻不应停留于信息的平面报道,在追求深度、立体的过程中,要对新闻信息进行历时性的纵向追溯和共时性的横向联系,利用背景资料唤起受众的集体记忆,对信息进行扩展、深化、解释、预示和展望。恰当运用背景资料,强化深度报道意识是增大新闻信息含量的重要途径。

依据以上研究发现与探讨,本研究最后就新闻背景资料的运用提出以下建议,以供电视新闻实务和相关研究者参考:

(一)重要新闻背景资料的运用,培养深度报道意识

背景资料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没有深度报道意识,不去纵向挖掘和横向联系,就难以发挥作用。新闻不应只停留在报道层次,准确地说,新闻报道首先应是满足人们信息需求的新闻传播。在多数媒体中,人们对新闻节目的依赖程度最高,因为它是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佳途径,所以新闻节目要重视对受众依赖的回报。《新闻联播》所播的新闻不可谓不重要,但根据信息传播原理,我们度量消息中所含信息量时,和其消息种类无关,同时,消息中所含信息量的多少与消息本身重要程度无关(倪波,霍丹,1996)。如“朱基与菲律宾总统举行会谈”(《新闻联播》,1999年11月28日)这条新闻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只报道会谈仪式性的内容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辞令,不对相关背景信息(南沙问题)作一揭示,新闻本身所具有的内涵就会趋于平淡,新闻信息含量也会降低,而且,由于此类新闻报道的千篇一律,反而会消解受众的收视兴趣,漠视其重要性。所以要重视新闻背景资料的运用,培养深度报道意识。

(二)背景资料的运用宜多元化和多样化

作为发达的符号形态,电视的传播形式是多维的,语言和画面营造的空间立体感,有利于将信息准确还原。信息魅力越大,接受者的兴趣也就越大,印象也越深刻。背景资料的运用应在与新闻事实相融的基础上,在新闻结构的层次变化中起到谐调作用。以画面配解说、嵌入式纯解说和隐入式纯解说等表现形式,根据新闻的内容和结构布局的需要合理安排背景资料的位置,将使新闻内部结构有序化,信息系统优化,从而提高整体效应和有效信息量。另外,在研究分析中还发现,作为声画一体的视听媒介,三档新闻节目对画面配解说的表现形式使用都不多,这就又提出了要在电视新闻制作技术和思维上充分积累经验,灵活调度背景画面资料,从而发挥媒介优势的要求。

(三)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在职训练

K.阿斯普(Asp,1980)认为新闻节目品质的评估有赖于新闻节目本身所具有的素质,比如记者对情况的了解,他提出相关背景资料的能力。所以应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培养,培养他们注重新闻的解释性,调查性,以社会科学方法进行新闻活动的的能力,新闻从业人员应尽快建立有关新闻背景资料的电子检索系统,包括文字类和图像类两种,同时加强与其他媒体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当然,未来的研究,也可以针对有关新闻从业人员的运用背景资料的意识及能力状况来进行。

陈力丹(1998):《试论说明性信息的接受特征与引导舆论》,《现代传播》总第95期,1~7页。

孙晓光(1992):《新闻信息量增值涵义及增值途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总第34期。

李元授(1994):《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喻国明(1996):《新闻作品信息含量问题初探》,论文集《嬗变的轨迹: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新闻传播与新闻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3~41页。

李瞻(1984):《新闻理论与实务》,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

李茂政(1992):《传播学:再见!宣伟伯》,台北美国教育出版社。

戴育贤(1994):《大众媒体与真实建构:一次现象社会学的探讨》,《新闻学研究》第48期,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69~192页。

郭镇之(1996):《商营政策比较:CBC与CCTV》,《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三卷第3期,32~48页。

倪波,霍丹(1996):《信息传播原理》,书目文献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收视调查报告》(1999),(简《收视调查》),第26~52期,央视一索福瑞调查公司。

《中央电视台观众满意度调查报告》(1999),(简《满意度调查》),第三季度,央视调查咨询中心。

《凤凰卫视中文台大陆收视情况调查概述》(1999),(简《大陆收视调查》)第三季度,国家统计局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

Gadamer,Hans Georg著,洪汉鼎译(1999):《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Wahrheit und methode.1986))(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De Fleur,M.L.,Ball Rokeach,S.著,杜力平译(1990):《大众传播学诸论》(Theories of mass communication.1989),新华出版社。

Severin,Werner J.,Tankard,Jr,James W.著,罗世宏译(1992):《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communication theories:Origins,methods,uses)台北:时英出版社。

Asp,K.(1980). Mass media as molders of opinion and suppliers of information,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1,332~354.

Barnhurst,K.G.,Mutz,D.(1997).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the decline in event centered reporting.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7(4)27~53.

Steele,C.A.,Barnhurst,K.G.(1996). The journalism of opinion:Network coverage in U.S.presidentail campaigns,1968-1988.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13,187~209

Edy,Jill, A.(1999). Journalistic uses of collective memory.Journal of Communication,49(2),71~85.

李岚

丨 传媒资讯网 丨 传媒学术网 丨 传媒考研网 丨 传媒博客 丨 传媒社区 丨 传媒书店 丨

丨 关于我们 丨 会员注册 丨 交换链接 丨 联系我们 丨 法律声明 丨 广告服务 丨

 中华传媒网 学术网
academicmediachina.net

© 2001-2007 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O61016

